



东北抗日义勇军

人物志

谭译 主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K825.2

TY / 1-2

东北抗日义勇军

人物志

译 谭 主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东北抗日义勇军人物志(下)

Dongbei Kangri Yiyongjun Renwuzhi

译 主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字数:160,000 开本:850×1168^{1/32} 印张:7^{3/4} 插页:11
印数: 1—2,600

1987年1月第1版 1987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张慧 责任校对: 周全

封面设计: 安迪

统一书号: 11090·170 定价: 2.40 元



王德林

目 录

“民族老英雄”——王德林	邵宇春	(1)
高玉山与他所领导的国民救国军	王希亮	(33)
义勇军时期的祁致中	胡淑英	(49)
苏炳文与海满抗战	江 渤	(57)
矢志救国的猛士——邓文	温永录	(93)
“五尺身躯何足惜，四省失地几时收？！”		
——记抗日民族英雄邓铁梅	罗占元	(103)
正气千秋		
——记抗日英雄苗可秀	罗占元	(133)
阎生堂血战五年记	李秉刚	(154)
刘壮飞与白君实	于慧芝 王玉珍	(165)
为救国而捐躯的民族英雄——孙永勤	王 驹	(178)
“宁为义勇死，节烈永芬芳”		
——记苦战辽西热边的高鹏振	王 驹	(192)
亮山抗日述闻	王 驳	(208)
“舍生只为救国”		
——记抗日烈士白子峰	李秉刚	(215)
积极与共产党人合作的义勇军首领		
——包景华	李秉刚	(221)
岁寒知松柏		
——记抗日英雄王凤阁烈士	李秉刚	(229)
后 记		(241)

“民族老英雄”——王德林

邵宇春

王德林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著名将领。“九一八”事变后，他以一个旧东北军下级军官的身份，愤然摈弃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率部抗日，组建了“中国国民救国军”（以下简称救国军），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于吉林东部的松花江畔和小长白山一带。他所指挥的抗日部队人数最多时达数万人，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不断给日本侵略军以重创。“人民到处欢迎，群呼为救国常胜将军”。^①虽然未能实现“驱逐日寇，收复失地”的夙愿，但那种矢志救国、奋勇杀敌的可贵精神，以及他愿同中国共产党人真诚合作、共御外敌的远见卓识，至今都是令人钦佩、使人难以忘怀的。一九三八年底，王德林为奔走抗日而心劳神悴不幸病故之时，我党曾发出专文悼念，并称誉他为“民族老英雄”。综观王德林的一生，他无愧于这一光荣称号。

（一）

王德林，字惠民，原名王林。一八七四年他出生在山东省

^① 栗天雄：《九一八与救国军》第四十九页，东北民众救国义勇军军政委员会编印（一九三二年九月）。

沂水县（今沂南县）徐家洼子（现后洼子）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王家祖居沂南桃花埠，世代行医。祖父是乡间的一个穷“郎中”，精治小儿痘疹。父继祖业，仍以给人治病为生，常常不远数十百里，为贫苦百姓施医治病，不取任何报酬，当地民众莫不交口称赞。后来，由于生活困苦所迫，其父带着全家逃荒来到徐家洼子，给徐姓地主打活，兼操医业，勉强度日。他有弟兄二人，王林行二。家境的贫寒使王林仅读了两年私塾便被迫辍学。以后，他开始跟父亲学医，稍长到徐姓地主家打短工，种菜园子，常常遭到地主的凌辱和打骂。父母的善良为人和助贫济弱的好品格，随着医术一起潜移默化地传给了王林，而地主的残酷压榨和虐待，却也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仇恨的火种。因而他自幼便憎恶那些欺贫凌弱、攀权结贵的势力小人，而同情那些勤劳淳朴却衣食无着的平民百姓。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爱憎愈加鲜明，一种要求摆脱受人奴役的愿望也愈加强烈。

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鲁南一带连年遭受灾害，大批难民离乡背井，来到东北谋生。年仅二十岁的王林，为反抗徐家地主的残酷压榨，也选择了这条“闯关东”的路。他辞别了双亲，随着逃难的乡亲徒步走出山海关，来到了战火弥漫的东北。当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刚刚结束，兵灾匪患闹得民不聊生。王林只好一个人奔波在吉林东部的山林中找活做，当过伐木工、窑工，后来便在密山县和兴凯湖东岸的龙王庙子等地给大户人家扛活。在此期间，他接触了许多惨遭帝国主义暴力压榨的苦难同胞，民族仇恨的火种在广大东北人民中间燃烧，也在年轻的王林的胸膛里越燃越烈。一八九六年六月，沙俄帝国乘李鸿章到俄国庆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之机，诱迫李鸿章代表清朝政府签订了《中俄密约》，沙俄帝国借此攫取了中东铁

路的筑路权及沿线地带的行政、矿藏采掘、森林开伐以及贸易减免税厘等等特权，东北人民反抗帝俄侵略的斗争日益高涨。王林这时也是磨拳擦掌，恨不得马上拿起刀枪与敌厮拏。但他转念一想，“不知道人家的虚实，怎好贸然下手”^①，于是他决定出国考察帝俄，寻找报仇雪耻的方略。

一八九九年三月，王林来到了双城子（苏名乌苏里斯克）一家俄国人开办的工厂做工。表面上他是以做工谋生，暗中则用心学习俄语，对帝俄国情进行调查。不到几个月的工夫，他即有了很大的收获，不仅粗知俄语，而且也掌握了不少的沙俄内部情况。这时正当帝俄大批招募中国人为其修筑中东路，王林便会同几位挚友，应募为中东铁路筑路工人。不久，一种偶然的机会，使他当上了数十百人的领工，这就给他组织力量展开抗俄斗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他借助“领工”的合法身分，奔走于绥芬河、九站、台马沟之间，详查了地理人情，熟记了山川地势等各方面自然情况，并进一步联络了各方民众，在台马沟山林内设下窝棚，作为筑路工人反抗帝俄的大本营。

翌年七月，沙俄帝国借口保护中东铁路的修筑，调集步兵、骑兵七千多人，兵分六路侵入东北。由于清朝政府的对外不抵抗，对内疯狂镇压义和团运动，致使帝俄军队先后占领了我宁安、穆棱、吉林等地，王林此时耳闻目睹沙俄军队野蛮行径，看到他们每到一处便对我苦难的同胞实行惨无人道的烧杀淫掠，真是怒火胸中烧、肝胆欲裂。他马上组织起弟兄百余人，追随着当时东北义和团的首领唐殿荣和“忠义军”首领刘单子（刘永和）等人，在中东铁路沿线袭击帝俄匪军。这支抗俄武装狠狠打击了沙俄匪军的嚣张气焰，同时也被他们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急欲铲除。一九〇一年三月间，沙俄派出一支

^① 《国闻周报》第十四卷第二十九期。

侦骑队将王林设在台马沟的抗俄大本营炸毁，其中有二十八位义士不幸殉难。事件发生后，王林会同受害人亲属联名上书宁安地方政府，要求官府出面为义民作主，共同惩治外寇。然而官府竟同外人一气，对此血案置之不理。这时王林才明白了外侮所以纷至沓来，正是由于清朝政府的腐朽媚外，于是他的反清抗俄的意识进一步地形成了。

一九〇三年四月，王林联合了受难烈士的亲友和各地爱国志士与民众代表，召开了控诉沙俄侵华罪行大会，他在会上慷慨陈词，历数了中国人倍受侵略者欺凌的事实，揭露了贪官污吏屈膝媚外的丑行，说得众人泣不成声，不断发出誓为死难同胞复仇的怒吼，个个都表示愿意跟随他抗俄到底。王林见时机成熟，便率领着群众到了双城子，公开竖起了“排俄救国被逼为寇”的义旗，从事反清抗俄斗争。同时，王林对其部下约法三章：第一、绝对不准扰害中国人；第二、对被俘的俄人只要他心服口服，不准轻加杀害；第三、要爱护和援助穷苦无告者。从此，王林开始了他的反清抗俄的“绿林”生涯，他的队伍活跃在中东铁路沿线的穆棱、绥芬一带，还经常出没于松花江和乌苏里江流域，专门截击沙俄车船，打击沙俄势力。十余年间，他率领部队打九站，攻七站，袭十站，一度占领索罗瓦挂及苇沙河、亚布力与新站等地。他每到一地都严约部下不得损害当地百姓的一草一木，同时将所掳获的财物粮食，分赈地方百姓，而且还为地方上排难解纷，锄强抑恶。因此“在吉东八县广大地区农民信仰他，拥护他”^①。这时王林已成为东北著名的“绿林”豪杰了。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王林继续在吉东进行抗俄活动。一九一七年九月，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为了实现其“满蒙独立”

^① 《访问录选编》（周保中专辑）。

的野心，蓄意收买王林为他们服务，便从朝鲜派遣了藤田大佐，专门来从事这一勾当。藤田受命后亲自到穆棱县石头河子王林的山寨，约王林密谈，结果一无所获地离去。十月间，藤田再次来见王林，这次他见了王林便说：“你们对（付）俄国，立了许多的功勋，可是你们政府还说你们是红胡子，这多令人气愤！多令人可耻！你看，你们中国不成一个国家了。哪个有办法，有力量，就能成大功立大业，将相无种，不是你们中国圣贤的话吗？我们现在觉得，只有你们才是英雄，只有你们这般真正英雄，才可以把握你们国家的大权，至少这满蒙应该是你们的。”接着，他又进一步诱惑说：“只要你们有决心作满蒙之王，或者作更大些的事，我们绝对无条件的予以物质上人才精神上的任何援助。”^①王林越听越感到刺耳，猛然刺痛了他二十年前深印在心灵上的创痕，顿时怒容满面，喝令左右将这个不怀好意的家伙赶走。结果，就在驱赶的时候，王林的部下从藤田的身上查获了有关东北边防的密件。王林预感到此兆不祥，这也绝非是个人生死之事，便急忙赶抄副本并附长信一封，陈述利害，随即派人送到吉林地方政府。

当时的吉林督军孟恩远是个较有民族自尊心的人物。他仔细阅读了王林送来的长信和密件，颇为王林的爱国胆识所感动。他立刻派延吉道尹张莲轩调查事件的原委，并派副官孟福德专程至宁安东京城邀请王林赴省城面谈。王林应邀到了省府后，一连在督军署中住了数日，每天同孟恩远长谈到午夜。王林对辽吉黑三省东部的山川地势、风土民情等等，了如指掌，对如何加强东北的边防，保持民族的尊严，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两个人谈得十分投机。末了，孟恩远提出欲收编王林所部，王林经过反复思考后表示同意，遂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

^① 《国闻周报》第十四卷第二十九期。

底，带着他的“绿林”弟兄原班不动地归编为吉林军第一旅第三营，王任营长，他的部下吴义成、孔宪荣等分任连长等职。是时，王林的三营名义上属延吉镇守使管辖，实际上是地方的独立营。受编之后，孟恩远为了表彰王林的抗俄反帝义举，“功惠于国，德泽在民”，特别在他原名王林二字间加了个“德”字，并以“惠民”为表字，自此，他的名字便正式改称王德林了。

在张作霖父子统治东北时期，驻延吉部队的主官和番号尽管几经变动，但是王德林任营长的“三营”却一直没有变化，所以当地的人们都习惯地称他的部队为“老三营”。正是这个具有反帝爱国斗争光荣历史的“老三营”，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成了吉东数万救国军的中坚力量，并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中，造就了一大批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的优秀领导人。

(二)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按照其蓄谋已久计划，悍然发动了举世共愤的“九一八”事变，自此，中日民族矛盾，首先在东北地区上升为主要矛盾。九月二十一日，多门二郎中将率日军第二师团一部，以装甲车为先导，开入吉林城，掌握吉林省军政大权的原驻吉副司令公署参谋长熙治亲迎日军进城。与此同时，吉林东境的蛟河、敦化、延吉、珲春、汪清、和龙等地也均为日军占领，于是王德林所在地区也就成了沦陷区。

日军占领吉林省会后，并没有集中优势兵力继续向吉林全境推进，而是采取了以华治华的侵略故伎，积极扶植傀儡政权来控制吉林全境，以便其腾出优势兵力继续北犯，图谋黑龙江省，夺取整个东北的侵略计划，而日军在占领了吉林后的首要

任务则是不遗余力地完成吉会铁路的全线开通。

先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一九〇九年同清朝政府签订的《中日间岛条约》中，攫取了修筑吉林至朝鲜境内的会宁市之间铁路的特权，并着手进行筑路准备。日本帝国主义所以特别急于修筑这条铁路，目的在于把我国东北和他们的殖民地朝鲜的铁路交通直接沟通起来，以便他们进一步地扩大对我国的经济掠夺和准备武装入侵。然而由于我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无论是北洋军阀政府还是张作霖的奉系地方政权，都未敢公开地同意全面地修筑吉会铁路，但日本帝国主义分段分期修筑铁路的阴谋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九一八”事变之前，天（宝山）图（们江）、吉（林）敦（化）两段铁路已分别于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八年建成，只差敦化到天宝山一段没有接通。所以在“九一八”事变后，熙洽一投降，日军便迫不及待地向熙洽提出全面修通吉会铁路的问题，并经过密议，由伪吉林长官公署同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订立了合同，决定暂由日方垫出日金三千万元作为筑路经费，并准许日方在敦化安设吉会路测量局，在敦化和瓮声砬子（今明月沟）等地都安置了日本警察所。

基于历史的教训，王德林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急欲修筑吉会铁路的险恶用心和这条铁路一旦修成后将给国家带来的危害比一般人看得更深远，更透彻。事变前，王德林就已经意识到日本帝国主义在吞并朝鲜之后，便加紧修筑吉会铁路，是包藏亡我之祸心的。因为吉会铁路一旦修成，仅仅需要二十四个小时，日本军队即能布满东北各地要隘。国难当头，王德林深深感到自己身为一个军人，应为保疆卫民尽责，“非牺牲不能求安全，非奋斗不能寻生路，驻防延吉，适当其冲”^①。事变

^① 《中国国民救国军抗日血战史》，第五九页，东北义勇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部编印。

后，他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为其入侵，迫不急待地抢修吉会铁路，更是五内俱焚，无比愤恨，他暗自下定决心，只要“一息尚存，决不许日本完成此吞并东北之吉会路”，加上当时“老三营”的许多爱国官兵，听说熙洽降敌，省城陷落，“老三营”所在的二十七旅旅长吉兴也随之附逆，早已义愤填膺，纷纷向王德林请缨杀敌。此时，王德林倘若振臂一呼，即刻树起抗日讨逆的大旗，率部举义是不成问题的。然而，作为富有军事斗争经验的王德林认为，这时举义还不是最好的时机，因为他麾下仅有数百人的队伍，而日军主力天野旅团正集中在吉敦路沿线疯狂侵扰，如果在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的情况下贸然举事，不但使自己的队伍难于保存和发展，同时也会给日本侵略军造成可乘之机，使其修通吉会铁路的阴谋得逞。王德林经过一番权衡之后，决定暂时虚与委蛇，待机行事。

十一月里的一天，王德林的顶头上司延吉镇守使兼旅长吉兴从延吉给他打来电话，告知他日方吉会铁路测量局将派人前往“老三营”防地进行勘测工作，并命令他对日方人员要尽全力保护，不可怠慢。王德林得到这一消息后，顿觉势态逼人。他不仅痛恨日本帝国主义侵我国土，蹂躏我骨肉同胞，更痛恨熙洽、吉兴之流苟且贪生，不顾国家民族的利益为敌效命。此时此刻，他感慨万分，热泪夺眶而涌，他发誓：国破山河在，作为一个堂堂的中国军人，决不能放下武器，哪怕能为国家争得一寸干净的土地，也死而无憾。他马上对其部下下达了戒严令。

第二天上午，日本的所谓测量队在熙洽派出的一个排军队的保护下，乘车从敦化向王德林驻地瓮声砬子开来。瓮声砬子地处敦化和延吉一线的中央，形势险要。它的四周是崇山峻岭，林深草茂，一条大路横卧在夹谷中间，两侧峭壁之上设有

守望炮台，具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这伙人，说是测量队，实际上只有五、六个斜披“满洲铁路株式会社”肩带，肩扛测量器、标杆、标旗的测量人员，其余都是头戴制帽，嵌着樱花帽徽的全副武装的日本军人。这伙强盗满以为有了吉兴旅长的关照，王德林必定会俯首听命，热情款待。因而带着那种惯有的不可一世的狂妄神态，直奔三营营部。然而，当他们面见王德林时，却没有见到他们所希望的那种奴颜婢膝的模样，也没有看出丝毫热情款待的意思，只见王德林庄重自若，毫无欢迎的表示。再看王的左右，都是全副武装，怒目而视，根本就没把他们这些所谓大日本“皇军”看在眼里，领头的日本人见到这种气势，不得不倒吸了几口冷气，硬着头皮“表明来意”。王德林听他们说完之后，从容不迫地回答道：“王某奉国家命令驻防此地，一切均须奉命而行。关于测绘吉会路这件事，现在还没有奉到我们政府的命令，还是请你们回去。俺这防地没俺政府的命令，是不让别人随便横行的。所以最好你们快快回去，好歹有些麻烦。”^①听了这番义正词严的答复之后，这伙日本人瞠目结舌，无言以对，他们一向以战胜国自居，自以为连熙洽、吉兴那样的显赫要员，对他们尚且客客气气，何况王德林这样一个小小的战败国营长呢？却不料就在这里碰了个硬钉子。

不过，这伙侵略者，并没有就此善罢甘休，几分钟后他们开始集合队伍，企图强行登山勘测，有的竟肆无忌惮地向插着“驻军区内，禁止通行”标牌的军事禁地奔去，妄图一举夺下山顶守望炮台。这时山顶守兵发出口令，并一再鸣枪警告，这伙强盗一概不听，继续向山顶爬行。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

① 《国闻周报》第十三卷第二十九期。

值日班长史忠恒①一声令下，枪声四起，立刻击毙闯入禁区的日军两名，余者仓皇溃逃。

事件发生后，王德林急忙打电话找知心朋友李延禄前来商议对策。李延禄原来是吉兴旅七团二营的排长，此时已晋升为骑兵连长。在王德林的心目中，李虽然是比自己年少二十几岁的青年军官，但是他正直爱国，并很有心计，所以有事总愿找他商量，二人情投意合。可是王德林并不知道李延禄同志已经是一位中共党员了。因李延禄同志当时正忙于准备参加中共延（边）和（龙）中心县委会议，电话没有接通，而延吉镇守使兼东北步兵二十七旅旅长吉兴却在这时来了通知，命令三营营长王德林亲自将肇事者押送到镇守使署接受面询。

原来，吉兴听到日本测量队有两人丧生，感到万分惊骇，马上派了一名团长会同日本驻延吉的军事顾问赶赴出事现场进行检查，结果得知被击毙的两名都是日本军人，他们身上所带的金币有四、五百元，还有金表等贵重物品，这些东西一无所缺，而子弹却击中了要害，于是他们认定此举乃是“要命不要钱”②的有计划、有目的的政治行动。但是，日本军方为了不使事态扩大，以利稳定吉东地区的局势，加速修通吉会铁路，没有直接诉诸武力，而是企图通过吉兴这个卖国贼来治服王德林和他的“老三营”。

当然，吉兴是唯日军之命是从的。他立刻打电话给王德林，王德林当即表示“人是不能交的，要交我自己去”。王德林的部下官兵，闻说营长要亲自独往镇守使署，纷纷前来劝阻，告以此行必是凶多吉少。王德林执意前往，跟随王德林多

① 史忠恒，吉林永吉人。一九三三年初王德林退入苏境后，史忠恒继续抗日，后率部参加东北抗日联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抗联第二军第二师师长。一九三六年与敌作战中壮烈牺牲。

② 万国安：《东北英雄传》第二五六页，一九三三年六月大华书局出版。

年的绿林弟兄孔宪荣连长表示，要亲自作他的随身保镖，共赴延吉镇守使署。十一月十七日，王德林带着孔宪荣一道来到延吉镇守使署。吉兴对于王德林本人及其“老三营”在吉东一带的影响早有所闻，他清楚地知道，若对王德林采取强硬手段，其部下立即会倒戈，况且日本方面的本意是对王德林及其“老三营”要暂取安抚、不可硬碰的策略。所以吉兴见了王德林后，只是强作笑脸客气地问道：“王营长，哈尔巴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王德林见一个日本军人坐在吉兴对面，早已气的脸色发白，所以听了吉兴的问话，便没好气地回答道：“报告镇守使，哈尔巴岭是本营第一连的防区，请准许一连孔连长报告”。孔宪荣随即气愤地说：“日本测量员事先并没有通知我们，随便上我们炮台，在我们防区里遍插日本国旗，这明明白白的是污辱我们中国，当时营长等因职守的关系，加以驱逐，而日本人反倒凶起来，我们打算请示命令又来不及，所以营长等才叫兵士将日本测量员击毙。”①吉兴听过这段答话，自知理屈无言可对，马上把头低了下来，而在座的那个日本军官则歇斯底里地破口大骂起来。王德林、孔宪荣等毫不示弱，怀着满腔的怒火冲到那个口出不逊的日本人面前，左右开弓，连劈几记耳光，这个日本军官捂着嘴巴，转过身来冲着吉兴恶狠狠地说道：“你们中国军官怎么这样的野蛮？”，王德林等人大声吼道：“我们不侵东京，不占大阪就不算野蛮！”②说完便忿忿而去。

事后，吉兴为了讨好日本侵略者，使日军顺利修通吉会铁路，迫使“老三营”离开原驻防地，移防到安图县古洞河一带。

① 《东北英雄传》第二五七页。一九三三年六月大华书局出版。

② 《东北英雄传》第二五八页。

然而，王德林等人痛打了日本“皇军”的消息却很快地就传开了，这一消息，使沦陷区的备受欺凌的父老同胞感到出气，同时也使骄横跋扈的日本侵略者受到了警告。日军既然不能直接治服王德林，便通过他们的奴才熙洽之流设下了一个圈套，诱使王德林就范。一九三二年一月初，熙洽将王德林所在的七团团长王澍棠召到省城，当面委为“吉林剿匪军”旅长，并声称提拔王德林为团长，令其所在部队扩编后调往榆树、五常一带，由于深恶指挥进攻冯占海等部抗日义勇军。利欲熏心的王澍棠受宠若惊，当即表示一切照办。随后兴致勃勃地返回敦化，把上述晋升和调防的决定告诉了王德林。王德林听后，知道这是日本人伙同熙洽之流设下的调虎离山之计，目的还是为了吉会铁路。他决定将计就计，趁此机会率众起义。于是，王德林一面佯作服从命令，亲率所部开赴吉林，一面派人暗中与冯占海抗日义勇军联络，“约定守望相助，互为犄角”^①。“三营”在行进途中，全体官兵有的磨拳擦掌，有的声泪俱下，纷纷敦促王德林勿失良机，速行反正。王德林见时机成熟，遂集合队伍，对部下官兵们说道：“请诸弟兄们放心，俺王德林只要还有一口气，决不能让倭奴把吉会路修通”，“俺宁作奋斗爱国之鬼，不作任人宰割之奴”。^②并当即宣布脱离熙洽逆军，反正救国，然后将全营官兵拉到延吉县小城子^③兵营，开始酝酿抗日讨逆的具体事宜。

听说王德林率部反正，吉东一带广大爱国志士纷纷响应。曾在三营任连长的吴义成，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就解甲定居敦化城内，以开饭馆为业，他得知王德林反正的消息后，又激

① ◀中国国民救国军抗日血战史▶第二页。

② ◀东北英雄传▶第五十九页。

③ 在今汪清县境内。